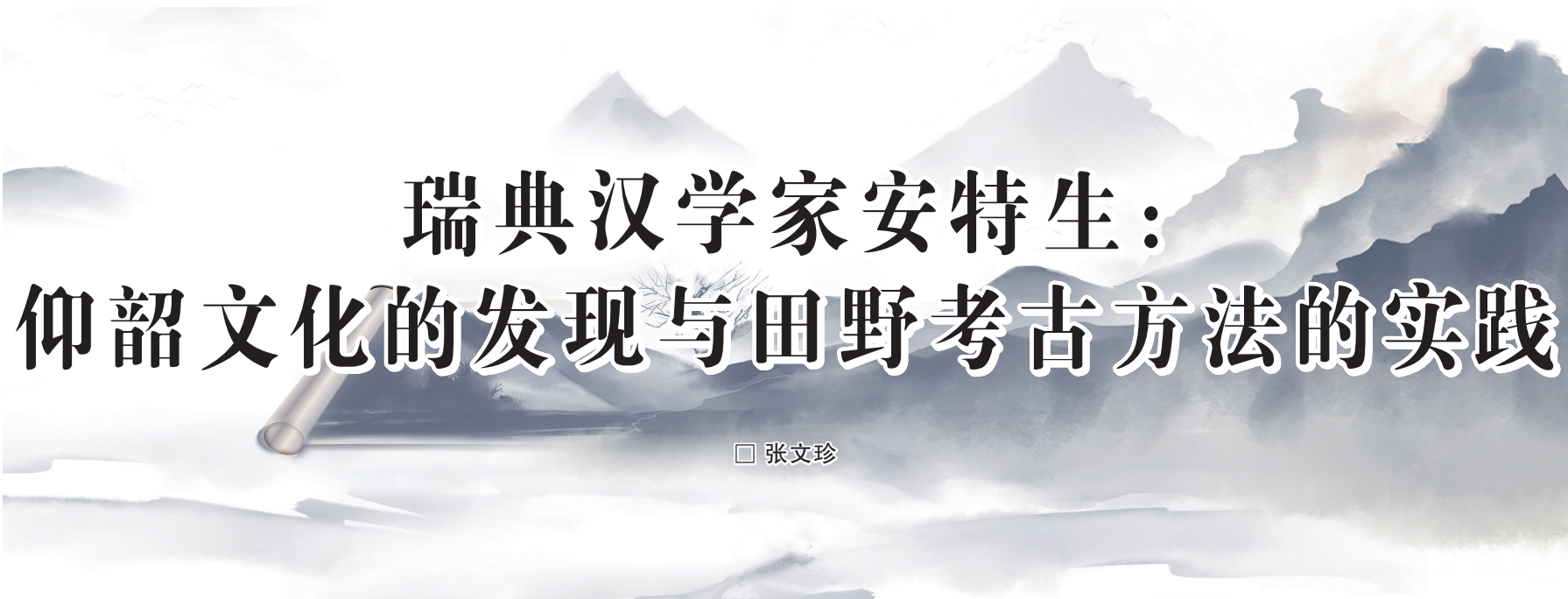




张文珍

瑞典汉学家安特生： 仰韶文化的发现与田野考古方法的实践

（一）

安特生在汉学家当中有一定特殊性，他是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同时也因为发现并深入研究“仰韶文化”这一中国远古文化体系而被学界视为杰出的汉学家。安特生1927年获“儒莲奖”，该奖项被称为“汉学界的诺贝尔奖”。

“仰韶文化”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个被正式命名的远古文化体系，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典型代表。但在1921年之前，中国人对此毫无认识，西方人则否认中国史前有石器时代。随着仰韶文化遗址考古成果的发布，这一切被彻底改写，证实了中国在史前存在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打破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观念，填补了中国远古文化发展史上的空白。同时仰韶文化遗址的发掘也标志着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史上的新纪元。而這些，都跟安特生有莫大的关系，他因此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

（二）

安特生，1874年7月3日出生于瑞典厄勒布鲁省的克尼斯塔，1960年10月29日卒于斯德哥尔摩。1910年，第11届国际地质学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作为乌普萨拉大学地质学专业的教授，安特生担任大会秘书长，与各国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建立了联系，并组织编写了两卷本的《世界铁矿资源》，其中有一章介绍中国的铁矿资源。这些成就不仅让他享有国际声誉，也引起了中国科学界的注意。

与此同时，远在东方的中国正处于动荡不安之中。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在实业部矿政司设立地质科，由章鸿钊担任科长。其后，由英国留学归来的丁文江任科长。丁文江积极推动创办了地质调查所，建议聘请具有世界声誉的安特生担任中国农商部矿政顾问。而安特生对古老的中国向往已久，他欣然应允中国政府的邀请，辞去在瑞典的一切职务，赴中国农商部就任。自1914年5月16日抵达北京，到1925年返回瑞典任斯德哥尔摩大学地质学教授，在华工作长达12年。

安特生的报告有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世界上引发广泛关注。对中国人来讲，中国自古以来的文献资料中从未有过对这段历史的记载，中国人压根不知道有这个历史阶段存在。“仰韶村遗址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史前村落，之前只知道夏商，因为仰韶的发现，我们明确知道了夏商之前有这么一个时期，这是中国发现的第一个史前文化，把中国历史向前推了至少2000年，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说。仰韶村地下遗存宣告了中国在夏商周等阶级社会之前存在着较为发达的新石器时代，破除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谬论，也说明中华文明从未中断，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对西方人来讲，欧洲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认为，人类的早期大都经历过石器时期、铜器时期、铁器时期，而对于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人来讲也理应有同样经历。他们把在中国找到石器时期存在的证据视为事关人类文明发展完整链条的重要一环，丰富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环节。

（三）

安特生对中国考古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发现了仰韶文化这一史前文化，还在于他引进了科学的考古理念，创立使用了一系列规范的方法，为后来的考古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示范和遵循。安特生的考古发掘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奠定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基础。对

自己的治国方针，但如何解决温饱仍为人生首务。即便如此，孟子也鲜明地拒绝嗟来之食。《孟子》中记载鲁缪公对待子思，屡次问候，又屡次送肉食给他，子思不高兴。最后一次，子思便挥手把来人赶出大门，然后朝背面磕头作揖拒绝了，并说，“我今天才知道君主是把我当狗马来蓄养的”。国君屡次问候子思，为什么子思反而感到羞辱甚至愤怒呢？国君要照顾君子，要怎样才能照顾好呢？孟子解释说：“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后廋人继粟，廋人继肉，不以君命将之。子思以为鼎肉，使己仆仆尔亟拜也，非养君子之道也。”杨逢彬先生翻译为：先称述君主的旨意送给他，他便作揖磕头而接受。然后管理仓库的人经常送来谷米，掌管伙食的人经常送来肉食，这些都不用称述君主的旨意了，接受者也就不可以不再磕头了。子思认为为了一块肉便让自己劳神费力作揖行礼，这不是照顾君子的方式。可见，就算是君主对君子有所馈赠，也要充分尊重君子的人格。相对于孔子，孟子更在乎君子的体面，更在意君子的人格尊严。为此，孟子还搬出了“天爵”这一概念。“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所谓“天爵”就是“四端”，是人人人生而具有的。“人爵”就是权力。孟子认为当下社会中的权力，往往是“既得人爵，而

春秋时期，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这时候，周天子已经失去对诸侯的控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诸侯国也很难控制卿大夫了。孔子生活在这种乱世之中，耳闻目睹的杀戮也不少，而自己颠沛流离也“累累若丧家之狗”。即便如此，《论语》第一章记载的却是“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通过学习，获得自身的提高，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自己的修养达到一定境界，朋友从远方慕名而来，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杨逢彬先生将最后一“乐”译为“别人没有弄明白，我也不生气”，这便是有德者的自信和快乐。孔子还经常引导学生去体会“乐”，最为人们熟知的自然是“孔颜之乐”：“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簞食、瓢饮、陋巷，构成了低标准、多苦难的物质生活，颜回却乐在其中。乐从何来？乐在自身。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与此相似。

孔孟多谈人格之尊严。孔子所处的春秋是乱世，孟子所处的战国更是乱世。对于孔孟而言，他们感受到的多是痛苦。孔孟要在痛苦中寻找快乐，在痛苦中找到人格自尊。因此孔子才有“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的话。孟子时代，社会各个阶层流动更为频繁，春秋时代不绝如缕的贵族制度更是不堪一击、难以继。知识分子虽然可以自由地在诸侯国之间流动，到处宣传

近年来，北洋甲午沉舰调查和发掘工作取得重要进展。2020年9月，定远舰重达18.7吨的铁甲在刘公岛起吊出水；2022年，靖远舰遗址第一期水下考古调查共发掘各类文物201件，通过发现的210毫米克虏伯炮弹验明了靖远舰的正身，此项工作入选“2022年度山东省五大考古新发现”。与此同时，山东省启动“明清海防遗址考古调查”工作，全面调查和登记了所辖区域海防遗址543处，其中新发现168处。这些珍贵的遗址和文物，是中华民族捍卫国家主权的历史见证，它们向世人诉说着明清时代维护国家安全的悠悠往事。

（一）

元朝末年，日本国内诸侯割据，战乱不休，一些在战争中失败的日本武士、浪人等，出没于中国的沿海进行武装走私和抢劫活动，被称为倭寇。明朝初年，倭寇主要在朝鲜沿海活动，并逐步向我国北方沿海延伸，山东成为倭寇活动的“重灾区”。为此，朱元璋在沿海建立了一套防卫机构和设施，并不断增加和完善，如卫所、巡检司，以及所辖的墩、堡或水城、水寨等等。卫是区域级最高级别的军事单位，有固定的防卫区域，有城池、城墙，屯驻重兵，兵民一体。所是次一级的军事单位，分布在沿海要害之地，归卫管辖。卫、所是海防体制中最为重要的军事据点。所之下还有寨，是相对较小的兵营；还有巡检司负责巡弋海疆。这样的设置，形成了较为严密的海防体制。洪武初年，原来只设登州卫和莱州卫，宁海为备御所，到了洪武十年，宁海升格为卫，并逐年加强。

（二）

清王朝建立之初，面临的海防压力巨大，有内有外，如李自成裨将赵应元领导的青州起义，于七在登州地区领导的抗清斗争以及在他们影响下的一系列抗清活动，在沿海一带给清政府统治带来了极大威胁。而从康熙末年开

除了建立海防系统，明成祖朱棣通过多种途径给日本政府施压控制倭寇，所以直到嘉靖中叶，倭寇只是零星来犯，未形成较大威胁。为了荡平倭寇，明代山东涌现一批著名将领和仁人志士。如抗倭名将戚继光，在25岁时即被任命为署都指挥金事，上任之初，戚继光就开始整顿军纪，训练士兵，加强战斗力，同时裁撤不称职官员，提拔一批年轻有为的将领。与此同时，积极处理民事案件，明察秋毫，秉公执法，得到了上下的认同。

戚继光在总督山东备倭期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军事训练、屯田生产和防倭设施的修建上；在沿海百姓中组织起民兵，保家卫国。他还全面考察所辖沿海卫所，每到一处都仔细检查防倭设备，及时维修，对官兵爱护有加，因此在他任职山东期间，山东的海防成为当时沿海各省份中最为牢固的防线之一。山东海防的牢固与江浙以东南沿海的“脆弱”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戚继光被调任浙江都司金书，并担任参将一职，防守宁波、绍兴、台州三郡。他亲自编写《纪效新书》指导练兵，创建了著名的“鸳鸯阵”，修建空心敌台，改良军备，组织起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抗倭军队——“戚家军”，为扫除沿海倭寇作出了重大贡献。

除戚继光外，还有一批抗倭将领、朝中大臣以及山东沿海州府官员，或直接参与经营海防，或朝奏皇帝重视海防建设，或提出具体的海防建议和部署，推动了山东的海防及抗倭活动取得一系列成就。

代生

从考古看明清山东海防